

领袖们的千古难题

萧蔚彬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领袖们的千古难题/萧蔚彬主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8

ISBN 7-218-02631-1/C · 78

I. 领...

II. ①萧...

III. ①政论—中国—现代选集②回忆录—中国

IV. ①D602②I251

领袖们的千古难题

萧蔚彬 主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厂址: 肇庆市狮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5 印张 1 插页 370,000 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218-02631-1/C ·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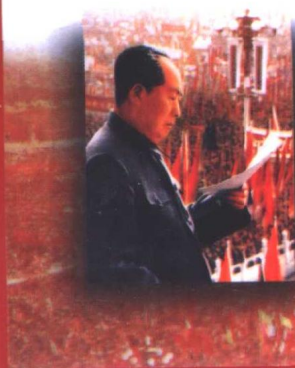
定价: 2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领袖们的千古难题

萧蔚彬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定价：24.00元

柯 灵

序

《同舟共进》是广东省政协主办的一种政治性期刊，刊龄已近十年，很受读书界倾心瞩目。《告别“万岁”》和《领袖们的千古难题》这两部书，就是《同舟共进》重要文字的汇编，读者可以由此看出这份期刊的品性风貌。

中国一百年来的内外环境，养成知识分子侈谈政治的坏习惯，其中的惨痛经验，如山之高，如海之深。白色，红色，五颜六色的恐怖浪潮，几乎淹没历史之舟，不免使人谈政色变。伟大领袖毛泽东熟读《红楼梦》，他引用王熙凤的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恕我懒得查书，不能确证是不是她说的），提倡敢言，号召六不怕：“不怕机会主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张闻天说：“这是对的，但光是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谁说得近情在理些呢？——问题不在近情违情，有理无理，而在于谁在“领导

上”，谁在“领导下”。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响应号召，说了真话，结果如何，尽人皆知。这就是政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政治理想和政治实际是两回事，政治理想常常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政治家拿来披在身上，招摇过市。知识分子刻舟求剑，就像那天真无知的孩子。也还是《红楼梦》里的故事，贾宝玉到宁国府赏梅花，秦可卿带他到上房歇息，一见墙上挂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返身却走，嚷嚷“快出去，快出去！”原来这位性情乖张的贵公子厌读经书，痛恨禄蠹，因此容不得这种世俗见解。现代知识分子多少沾染了贾宝玉的傻气，其实少沉迷太虚幻境，多学点人情世务，受用多了。

《同舟共进》虽是政治性刊物，却不唯上，不唯书，不念经，不念咒，不迂雾腾腾，“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是实话实说，与读者肝胆相照。谈言微中，大多能搔到痒处，触到痛处，言之有物，嚼之有味。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许多作者曾经沧海，回首前尘，痛定思痛，拨开政治雾幃，还原历史真相，读之可浮一大白。

从前政治挂帅，满世界阶级斗争；现在经济升帐，满脑子钞票打架。道德文章，能值几文？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莫谈国是，且食蛤蜊，是为序。

1998，儿童节。童言无忌。

目 录

毛泽东早年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追求	汪澍白 (1)
智者不惑, 仁者不忧, 勇者不惧	闻 朔 (17)
忆“广州会议”	于光远 (32)
范文澜“史谏”中央领导	李 新 (44)
黄秋耘“漏网”记	黄伟经 (48)
陶铸与“反瞒产”事件	林 里 (60)
沈醉智斗红卫兵	汪东林 (64)
梁漱溟誓死拒绝“批孔”	汪东林 (69)
迎风而立田家英	林 雪 (80)
我眼中的“阎王”们	秦 川 (96)
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	王若水 (116)
死难者的昭雪	戴 煌 (141)
《第二次握手》文字狱始末	张 扬 (164)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对话	吴 江 (220)
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	李 锐 (242)
“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何在	李 锐 (256)
以言治罪的悲剧	刘建明 (288)
欺君有罪	周正仁 (295)

良知的魅力	高 光 (303)
义无反顾地探索	高 光 (308)
昨日的一则故事	傅白芦 (313)
反思历史还要反思自我	汪澍白 (320)
宝塔山上的徘徊	胡绩伟 (327)
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斗争	邵燕祥 (335)
文化怪胎——大字报	曾伯炎 (342)
中国知识分子的事业	谌 震 (347)
话说孔子	李 新 (353)
从“传统”说到“皇权”	李冰封 (361)
奇怪的“信心”	黄一龙 (366)
心灵和自然的对话	韦 弦 (372)
历史不饶人	马为民 (381)
摆脱人身和思想依附的三大瑰宝	蔡德诚 (390)
展望与祝愿	萧 乾 (402)
化干戈为玉帛	柯 灵 (404)
同情高检	邵燕祥 (409)
论“真正的共产党人”	邵燕祥 (413)
场外说官	邵燕祥 (418)
领袖们的千古难题	黄一龙 (429)
梦里的爱国主义和清醒的爱国主义	黄一龙 (432)
江青·女皇·卒子	李 普 (435)
必也正名乎	牧 惠 (438)
高家堰故事	钟叔河 (443)
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	冯东书 (447)
精神文明与精神行贿	曾伯炎 (452)
呼唤“权力学”	毛志成 (456)

难道要事事“惊动总书记”	张 扬 (460)
谁是马克思	吴 非 (466)
赵括纸上谈兵的背后	吴 非 (469)
多留下一点历史的真实	阎良臣 (473)
深圳人不应该忘记	赵 牧 (479)
丢脸种种	乐 朋 (481)
 编后记	 萧蔚彬 (484)

汪澍白

毛泽东早年对 空想社会主义的追求

毛泽东在1976年病危之际，曾召见华国锋、王洪文、江青等人倾诉衷肠，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赶走蒋介石；第二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前者奠定了创建新中国的基业，后者则是一场空前的浩劫。

毛泽东为什么要断然发动并坚决维护这一场贬损他声誉的“文化大革命”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越来越觉得他所创建的党和国家同他心目中所企盼的“左”倾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差距太大。而这种“左”倾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既是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错误总结，又是早年空想社会主义模式的复活与延伸。为了探明毛泽东“左”倾社会主义模式的本源，本文拟就其早年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多方追求作一番历史考察。

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

毛泽东是农家子弟，自小在乡塾上学，读孔孟之书。但他却从来不是百分之百的儒学信徒，还不时会萌发出一些“异端”思想。当他13岁在井湾里读私塾时，便十分嗜读被称为“闲书”、“杂书”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岳飞传》、《水浒》等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演义小说。这些故事都是首先在民间流传，经说书人和戏曲艺人补充内容，逐渐丰富起来，最后由知识分子——作家加工改写而成。它们在价值取向上程度不同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愿望与要求，因而为一般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

青少年人爱看演义小说，这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毛泽东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不独对阅读和讲述这些小说故事怀有浓厚的兴趣，还思索到一些别人难以想到的问题。他后来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道：“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他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文官，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旧小说虽然对阶级矛盾也有所揭露，但却没有一本书是正面从经济关系上揭露矛盾的。毛泽东那时小小的年纪，却独具慧眼，触及了中国传统社会矛盾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他虽然生长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却喜欢与穷人的孩子玩在一起。在家里干农活，也总是与长工同出同归。他的思想感情与那些帮别人种田的贫苦农民是息息相通的。

在众多古典小说中，唯有《水浒》写的是一群打家劫舍的强盗。正如作者施耐庵在“排座次”一回中所赞叹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哥弟称呼，不分贵贱。”毛泽东从小就对这些不分贵贱的英雄豪杰深表同情。建党以后，他也是党内最重视工农群众与工农武装的人。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新中国建立以后，他在一次邀约周谷城等学者谈话时，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这些话，表达出一种很深的情结。

著名作家赛珍珠女士翻译的《水浒》英文本，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作为书名。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口号，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种巧合，恰好表明，中国的早期社会主义者在认同马克思主义时，早已具有在传统文化基础（特别是以《水浒》为代表的歌颂农民起义的反规范文化）上形成的认识前结构。投身革命后，毛泽东讲话和写文章，还是经常引用《水浒》。1944年1月9日，在看了新编平剧《逼上梁山》以后，毛泽东写信给杨绍萱、齐燕铭说：“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这封信，充分表明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与水泊梁山“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平等、平均理想，正是一脉相承的。

二、江亢虎的社会改良主义

江亢虎（1883～1954）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接受儒学教育，“慕大同之治”。自1901年至1910年，他三次赴日本及欧洲访学，广泛接触各种社会思潮，并把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糅合在一起，最早在中国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

1911年8月，江亢虎在上海组成“社会主义研究会”。同年11月，又在上海创建中国社会党。江亢虎提出八条纲领，即：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建设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限制军备并致力军备以外之经营。同时，又上书袁世凯，自称这些纲领“多与三代井田、学校制度及孔子《礼运》所称道者先后一揆”。这就表明他那时所宣扬的不过是西方社会改良主义与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杂拌而已。

1912年春，中国社会党在长沙成立了湖南支部，并通过《湘汉新闻》等报刊开展宣传工作。毛泽东这时正在新军中当兵，精神方面处于饥饿状态。当他第一次听到“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并读到一些有关的小册子时，立即引起了心灵上的共鸣。他忙着与几个原来的学友联系，就这个问题提出讨论，但应者寥寥。

二十多年过去，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回忆1911年底至1912年春在长沙当兵时的往事说：“当时鼓吹革命的报纸中有《湘江日报》（实为《湘汉新闻》之误）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

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表示同意。”毛泽东的这一段回忆，是研究他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发展过程的珍贵资料。

再过20年以后，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在批判第二国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时说：“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影响很小。”（《人民日报》1979年9月9日）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虽则很小，但对从小就衷心向往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却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三、康有为的《大同书》

康有为（1858~1927）在戊戌变法前就悬想“大同之世”。1901~1902年，在避居印度大吉岭时，撰成《大同书》初稿。该书借用《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将社会进化过程划分为三大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同时，又融合《礼记·礼运》中关于小康、大同的说法，以太平世附会大同，悬为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实际上，康有为是把欧美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糅合在一起，以“托古改制”的手法，对儒家“大同”理想做了一番新的阐释。并指出，目前中国处于“据乱世”，必须向已进入“升平世”的欧美资本主义看齐，待条件成熟时再转向“太平世”，亦即理想中的大同世界。

《大同书》有破有立。破的方面，指陈产生人世间诸苦的九种障碍，提出“破九界”的主张，即打破国家、阶级、种族、男女、家庭、产业、地域、人己、物我等诸种界限，以求达到众生平等、万物一体的境界。在立的方面，《大同书》设

计的要点，是男女自由同居，妇女怀孕入胎教院，婴儿出生入育婴院，幼儿入怀幼院；童子按年龄入小、中、大各级学院。通过“公养”、“公教”，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优秀的文化素质与技能，然后量才使用，为社会服务。至老弱病残，则设有“养老院”、“养病院”，以“公恤之”。康有为的这种设计，当然纯粹是一种幻想，但它对不满旧社会而向往“大同”理想的青年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在讲了一大套圣贤慈悲救世的道理之后，接着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可见他那时深信康有为的三世进化理论，并把最终实现“太平大同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两年以后，毛泽东于1919年12月1日所发表的《学生之工作》详细地描述了他对社会主义工读新村的设计蓝图，其中不少思想材料显然是从康氏《大同书》中撷取的。

再过30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其实，毛泽东1919年的《学生之工作》和1966年的“五七指示”，追求在当时的条件下立即实现大同理想，也都同样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可见找到一条到达大同之路，极不容易。

四、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本来是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中国社会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这就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

早在本世纪头 10 年，留日学生刘师培、张继和留法学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就在东京和巴黎组织团体，创办《天义报》、《新世纪》，宣扬无政府主义，强调反对强权，排斥国家政权，提倡绝对自由。

辛亥革命以后，传播无政府主义的热点从海外移到国内。代表人物是刘师复。刘早岁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7 年，他在广州暗杀水师提督李准，事泄被捕。在狱中悉心研读了《新世纪》，思想开始转向无政府主义。出狱后，自称属于“反抗强权之革命党，而非复政治之革命党”。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几乎囊括了西方各个无政府主义流派的思想，而以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为信仰中心。1912 年 5 月，他在广州组成了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舍，并为该会拟定了八条纲领：“共产主义；反对军阀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庭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1913 年 8 月在广州发刊《晦鸣录》，宣称：“今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已悉数被夺于强权。”“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1914 年 7 月，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发表宣言称：“主张灭除资本主义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

毛泽东在第一次北游访学期间（1918 年 8 月至 1919 年 4 月）阅读过刘师复的《晦鸣录》与《伏虎记》，并从中接受了反对一切强权的思想。1919 年 7 月 21 日，他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文中写道：“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在他所标举的五位领袖名流中，刘师复赫然在目。

关于反对一切强权的思想，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 年 7 月 14 日）中有明确表示：

各种改革，一言以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激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的主旨非常鲜明：反抗各种强权，争取平民的自由平等，方法是和平的而非暴力的。

《湘江评论》接着又发表了毛泽东的一篇题为《民众的大联合》的重要文章，对平民大联合以后的行动方式，做了更具体的阐释：

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

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人，叫做克鲁泡特金。

通过对所谓激烈派与温和派的对比分析，毛泽东否定了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主张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的激烈派，而选择了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主张阶级调和与互助的无政府主义温和派，态度是很明白的。

这一时期，毛泽东很可能还阅读过岭南羽衣女士著的章回小说《东欧女豪杰》（1903年发表于《新小说》）。该小说叙述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苏菲娅等人的故事。苏菲娅在乌拉尔工厂讲演时说：“他们贵族那么少，我们平民这么多，若使我们的大众合起一个大大的团体来，……”后来，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写道：“又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的联合起来。”这句话，似脱胎于苏菲娅的演说。

除此之外，毛泽东与提倡新虚无主义的朱谦之也有一段交往。朱谦之于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一边读书，一边著书立说，宣传他的新虚无主义思想。他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道家的无为与佛家的色空观融合在一起，提出“以无政府主义的手段，以虚无主义为目的”的主张。他不仅强调反对国家和社会的一切强权，而且认为天地本身就是一种强权，说要进行所谓“宇宙革命”，“连天然强权都要推翻”。并声称只有“虚空破碎，大地平沉”，才是根本的解决；一旦“天地翻覆”，“宇宙又可以从无到有，然后再加以破坏，如此循环不已”。毛泽东一向抱有反抗强权的思想，而且他对宇宙的成毁问题也早就抒发过独特的见解：“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